

May 2020

## Is "Place" Ended: Dialectical Thoughts on Space Theory

Jun Zh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Zhu, Jun. 2020. "Is "Place" Ended: Dialectical Thoughts on Space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0, (3): pp.136-144.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0/iss3/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地方”终结了吗：空间理论的辩证思考

朱 军

**摘要：**全球化时代地方感的重塑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美学经验。现代交通、媒介、大众文化乃至城市的主题公园化，助长了“无地方性”美学的扩散。面对“地方终结”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空间论者认为“地方”因其多重变形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仅重塑了感觉结构，也重建了都市情境和社会结构。当下需要抛弃对“地方”偏执的理解并保留对特殊性和独特性美学的欣赏，重建一种“全球地方感”——一种更辩证、开放的本土性想象和社会空间实践。这对于“逆全球化思潮”的纠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地方”； 空间理论； 全球地方感； 都市情境； “过程辩证法”

**作者简介：**朱军，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都市文化理论和近现代文学与文论研究。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创新团队成果。通讯地址：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200234。电子邮箱：zhujun648@shnu.edu.cn

**Title:** Is “Place” Ended: Dialectical Thoughts on Space Theory

**Abstract:** Globalization has reshaped our sense of place and this reshaping has profound impact on human aesthetic experience. Modern transportation, media, mass culture and theme — parkization of cities accelerate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aesthetics of placelessness. Facing the crisis of “the end of Place”, Marxist theorists on space believe that “pla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due to its multiple deformations. Place not only reshapes the structure of senses but also reconstructs urban situ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re is at present a need to discard the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place while retaining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particularity and uniqueness, so as to rebuild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This global sense of place is a kind of local imagination and social-spatial practice which will be more dialectical and open, and it may have enlighten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place; theory of space;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urban situation; dialectics of process

**Author:** Zhu Jun, Ph. D.,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Urba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urban culture theo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Address: 100 Guilin Road, Shanghai 200234, China. Email: zhujun648@shnu.edu.cn

人类的美学经验离不开“地理感”。“地理感”因“人”之具有评价选择机能而对环境有不同的“感的回应”，同时任何回应也具有理性意义、价值意义（潘桂成 8）。“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是人类地理感的来源，也是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研究的逻辑起点。无论是文化生态主义（韦伯、西美尔、斯宾格勒、芝加哥学派等）、人本

主义（段义孚、雷尔夫等）还是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等）立场的空间研究，“空间”往往是自由、开阔与全球化的符号，而“地方”是封闭、宁静与本土化的象征。全球化时代地方感的重构集中体现了“空间”与“地方”的辩证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视域下的地方思想，试图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双重背景中，

有针对性地回应全球化的诸多文化症候。自列斐伏尔以来,都市往往被想象为一个浓缩的全球或世界,同时世界被想象为一个都市(Rob Shields 141)。面对“逆全球化思潮”,马克思主义对于城市空间社会性、辩证性、开放性的强调及其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和纠偏的意义。

## 一、地方的终结

全球化时代,地球是平的。那种李帕德笔下“内在于一个人生命地图里的经纬”(Lucy Lippard 7)消逝了,“地方”看起来越来越呈现出雷同的面貌,社区、购物中心、商店、旅馆差不多同一个模样,地方感变得非常淡漠,“地方”正在加速被侵蚀,这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提出一个严峻的质问:“地方”是否即将终结?

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性》表达出人文地理学家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来自于全球化时代地方“本真性”的消逝。海德格尔从“栖居”发展出“本真性”的概念,“本真性”意味着“作为一种存在形式,真实性乃是替自己的存在负责的完整体认和接纳”(Relph 78)。这种对“地方”的完整体认,往往被称为“圈内人”意识,即内在于一个地方,意味着归属与认同,你越深入内在,地方认同感就越强烈,相反“圈外人”意识则意味着与地方的疏离,是一种存在的外部性。

现代人为“无地方性”所缠绕,普遍沦为存在的“圈外人”。现代交通、媒体、大众文化及其制造的“流动性”,鼓舞了“无地方性”,进而传播了对于“地方”的不真实态度,削弱了地方认同,地方不仅看起来很像,而且感觉也雷同,提供了同样枯燥乏味的经验可能性。譬如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横越并强加于地景之上,它们“从每个地方出发,却不通往任何地方”(Relph 90),仅仅促成人群大量移动,搬家变得家常便饭,家园不再有归属感。再譬如城市建设的日益主题公园化、奇观化、博物馆化和未来化,极大助长了“无地方性”的扩散:

“迪斯尼化”的场所是一些荒唐的、合成性的地方,它将历史、神话、现实和幻想进行了超现实的组合,这些景观与某一特定的地理环境没有什么关系。(20)

迪斯尼是“无地方性”的代表,艾柯、哈维、詹姆逊、鲍德里亚、索亚、迪尔、段义孚、雷尔夫、柏林特等人多有论述。迪斯尼集中体现了后现代文化中的拼贴、复制特质,对全球各种地域和历史文化的模仿呈现为“主题化”的景观美学,其中似乎表达出对地方性及其过往的依恋,甚至流露出一种感伤的现代主义情调,但却是超真实的“仿真图像”,本质上架空了地方性,或者说体现了一种没有归属感、虚伪的地方性美学。它们是外地人或“他者”的创作,并不是本土文化真实的表现,其象征意义也是“面向他者”的。用雷尔夫的话说,迪斯尼是一种“无地方”(Placeless)的地方:

一种欺骗的建构展开,这种欺骗尽管摆出一副熟悉的幸福面容,却在不断地使自己远离(它周围的城市)大多数基本的现实性。这一城市的建筑几乎是纯粹符号性的主题公园建筑,玩弄着嫁接意义的符号游戏。无论此类设计代表着一般的史实性还是一般的现代性,都是基于与广告相同的演绎,即纯粹的可想象性这一观点。(Sorkin xiv)

迪斯尼美学在全球的风行,带来了城市的主题公园化。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建筑波普”运动,强调“表演和奇观”的“布景”景观模式从起先的主题公园、娱乐总会、购物中心,逐渐向城市真实生活的街道、广场、公园、新城等各个层面渗透。从波士顿滨水地区扩展到巴尔的摩、纽约、旧金山、伦敦、悉尼港区、拉斯维加斯乃至上海的环球港、泰晤士小镇等等。在哈贝马斯看来,消费主义的兴起、媒体的商业化、媒体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勾结,构成了公共空间的衰弱。城市的迪斯尼化“从而可以营造这样的地方:它提供了一种身为‘公共’的一部分的感觉,但事实上它们却是经过校准和煞费苦心编制的制造利润的机器”(艾伦·莱瑟姆 164),同时它带来了千城一面的“普世一律的城市主义”(Urbanism of Universal Equivalence)(Sorkin 217)。

哈贝马斯哀叹公共空间的衰弱,但他把原因归结为内在的消费主义美学的崛起,雷尔夫则强调存在的“圈内人”性质,但他认为“地方”正变为“他者导向”。事实上,“无地方性”的美学不能简

单认为是外部资本积累需求,也不能归结为对内  
在归属感的无望追逐,而是内外双重结果。

不可忽视的是,媒介与技术的无界性也构成了对地理空间的消蚀,横越地球的短暂连接变得越来越像,移动性和大众文化导致了非理性、肤浅的地理景观和空间美学。后现代美学状况让都市人普遍处于无家可归状态,梅罗维茨《无地感》指出技术会重组社会环境,这会最终降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人类迫切需要思考如何立足于“消失的地方”,梅罗维茨说:

现在,你可以在不亲历现场的情况下成为一场社会表演的观众;你可以不与别人在同一个地点会面的情况下与其“直接”交流。其结果是,那些曾经将社会分为许多截然不同的互动空间环境的物理结构,其社会重要性已大为降低。  
(Meyrowitz vii)

对于“地方”是否终结的探讨似乎又回到海德格尔有关栖居本质之思考。面对人的人类性和物的物性在全球化空间中的消解,商品、市场和媒介制造了普遍的“无距离”状态,带来了自我建构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在无数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地方”曾经作为自我存在的隐喻,而今自我存在的形成难以依赖内生的、剥离了流动性与距离体验的地方,这造成了普遍的无根基状态——人的无家可归状态。

## 二、“地方越来越重要”:地方的多重变形与再结构

海德格尔的无地可栖显然太过“多愁善感”了,因为过度地去资本化和去市场化,只能落入狭隘的地方主义信仰,忽视了现实的经济与资本流动对建构现代性地方的社会作用(*Between Space and Time* 418-34)。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言,外在的社会关系建构与内在的本真性追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过度强调内在的、本真的、感官的体验,会导致“地方”演绎为意识形态的想象,因为这会掩盖地方和世界的物质和社会联系,进而模糊社会联系中的权力关系。

因此,哈维特别强调“地方越来越重要而非

越来越不重要”(“*Justice, Nature*” 296-98)。“地方”的重构一直并且持续地内在于资本积累之政治经济学:其一,1970年代以来,时空关系被彻底重构,并且改变了“地方”在资本积累的全球样态中的相对位置。底特律、谢菲尔德、利物浦、里尔等城市被抛弃,地方的安全普遍受到威胁,造成了人们担心“地方”的一般意义以及自身所在地方的特殊意义被消解;其二,交通和通讯落后于时代,由于距离的摩擦作用,地方免于竞争,拥有一种高水平垄断力量,但是如今地理流动更加容易,地方固有的垄断权力大大削弱;其三,那些扎根于一个地方的人强烈意识到,他们正在与其他地方竞争高度流动的资本,这迫使他们出售“地方”,运用各种广告和形象包装来提高本土的可区别性;其四,近20年,吸收过剩资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其中相当大部分陷入投机性地方建设。养老和旅游胜地、新生活社区、文化中心、特色小镇、休闲城市、主题公园和主题公园化的城市投资变得愈发积极,这些集中于消费景观的投资,意在出售地方形象,争夺文化和象征资本,恢复消费的吸引力以及本土传统文化。不遗余力营造的地方形象及其特定品质往往呈现出“奇观与戏剧性的组合”(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92-93),但这一竞争过程也呈现出负面效应,创造了同质的复制品,也就是“无地方”的地方。

“地方”由此终结了吗?从哈维对海德格尔的反驳中,“地方”出现了诸多变形,海德格尔和雷尔夫现象学视野下的“无地方”具有负面的道德意涵,而“地方”并没有真正终结,而是变幻为各种“非地方”(Non-places)或者“类地方”(Almost-places)。鲍德里亚、哈维、欧莒、史瑞夫特等人的解读更强调地方与移动、瞬间、短暂相连,是将各种移动性安置于彼此的关系之中。欧莒与鲍德里亚一样认同,对于旅行的迷恋,已经将“非地方”理解为在世存在的方式,后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便是新的移动的思考方式,作为“非地方”的旅行者空间似乎比有根的地方更让新生代有归属感。史瑞夫特进一步认为,这种移动性应该被看作一种新的“感觉结构”:

在之中(in-between)的世界里,“地方”是什么?简单的回答是——折衷:永远处于发声状态,介于不同地址之间,

总是推迟不定,充满移动、速度和流通的踪迹,我们可能读过“类地方”的描述[……]按照鲍德里亚的术语,这是第三级的拟像世界,入侵的虚假地方终于完全消除了“地方”。或者,“地方”是策略性的装置,捕获交通的固定地址。或者,最后,我们可能将它们解读为各种空间、时间和速度实践的框架。(Thrift 212-13)

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地方”作为感觉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将“地方”看作社会结构,他们都试图在时空压缩的全球化空间中重新把握“地方”。不过列斐伏尔、德波等人认为,无论借助旅行获取地方经验,还是借助图像走向日常经验,重新获得“地方感”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譬如现代旅游名城疏离了家乡和归属地,而是赤裸透明的符号。拉斯维加斯和迪斯尼制造的巴黎、罗马的幻境,成为孤零零的景点、盆景,变成了仅供观看的图像,世界万物也不再神圣,而是工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所控制的资源、图像和符号。城市化的隔离进一步制造了集体性的孤独,随着城市公共性的衰落,景观和图像开始占据公共性退却后的空间,在无所不在占统治性地位的图像中,“景观信息填满了孤独,而景观恰好从这一孤独中获取了它们全部的力量”(Guy Debord 172)。

“消失的地方感”意味着媒体传播促成了空间实际距离的瓦解,单向度的信息流创造了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全球同质化。当然这一观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譬如库尔德里和麦卡锡认为,正在显现的画面不是“地方”的瓦解——实际上,由于媒体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前往远方旅行的理由是增加而非减少了——而且我们与其他地方和当事人的互动被更加细致地整合进了我们的日常经验流中(Couldry 9)。

也就是说,媒体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可以增加“规模效应”,地方与全球化、消费与空间分布之间的差异,会将地方经验重新整合进我们的日常经验流之中。“我们或可称之为经验性非地方的东西不断扩增,乃是当代世界的特色。流通空间(高速公路、航空)、消费(百货公司、超级市场)与传播(电话、传真、电视、网络),在当今全球占据了更多空间。它们使大家不必生活在一起,就可以共存或同

居于空间”(Auge 110)。库尔德里《加冕街》拍摄地的参观者研究也试图说明,观众在媒介化空间中扮演关键因素,观众有可能走向图像,或者让图像走向自己。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观众借助媒体可以得到定位——在过去、未来和空间中的定位。

在后现代文化中,“地方”不再是固定的位置,从此意义上说,地方终结了,但是正如李帕德所言“心理的地理有必要归属某处,这是普遍疏离的解药”(Lucy Lippard 20),恰恰在普遍的“非地方”和“无地方”的孤独情境中,“地方”更加凸显为人类互动的意义核心和彼此观照的基础领域。在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视野下,全球化强化了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扩张,也让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得以彰显,促使人们回归“保卫地方”的美学实践,甚至激发出一种威廉斯式地方性的“战斗的特殊主义”。换言之,“地方”并未真正消逝,而是具有了多重面貌,并且因其推动了后现代都市感觉结构的转型,显得越来越重要。

### 三、“退回地方”：对一种敌意立场的批判

“空间”原本与开阔性、自由性联系在一起,而“地方”多与归属感、封闭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和人本主义地理研究都认同“空间”和“地方”内涵的辩证性。人本主义地理学虽更强调“地方”的庇护性和家园感,但同样赞同神学家伊曼纽·史威登堡所言,“天使愈多的地方,愈多自由空间”。天使本质并不占有空间,而空间因天使的无私而被创造。相反,人群的拥挤常成为我们挫败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西方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家庭常因为拥挤而丧失隐私权,乃至生存权益被剥夺,尽管拥挤的空间也代表了对地方性的亲密、温暖的偏好(Yi-Fu Tuan 57-59)。

里尔克《朝圣书》“机器隆隆效人欲,未见送来真幸福;金属怀着乡愁病,生机渺渺无处寻。欲离钱币和齿轮,离开工厂和金库;回归敞开山脉中,山脉纳之将门闭”,为海德格尔及其追随者提供了重新想象“地方”的路径。(海德格尔 297—298)从现代性的批判激发出人们回归地方、家乡的渴望,这是空间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论路线图。哈维甚至追溯到莫尔《乌托邦》中对于神话、完美小镇所代表的黄金时代,在技术成为“世界新主人”的时代“离开工厂和金库”,意味着对静态精

神秩序以及和谐社会模式的怀旧。

在全球化时代,空间与技术的全球化联系更紧密,然而“机器隆隆效人欲,未见送来真幸福”,“地方”也可能退行为一种“本土”的信仰。曼纽·卡斯特尔在《城市问题》中批评道,“有关‘都市社会’的著述正是直接建基于神话的基础上,并反过来又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关键词,种族中心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合二为一了”(Manuel Castell 83)。此言隐藏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对列斐伏尔尖刻的批判,在卡斯特尔看来,不论是作为“空间”、整体的、全球化的“都市文化”还是作为“地方”、差异的、区域性的亚文化,既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理论,而可能沦为一个虚构出来的神话、一种意识形态的流行叙事,列斐伏尔“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真正顶峰‘都市社会’”同样潜藏着地方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空间性(全球性)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合流。

究其缘由,“地方”之所以获得图腾般的共鸣,因其象征价值往往被过度征用。“地方”指向着日常、真实、有价的实践领域,成为意义的地理源泉,在全球流动时代不断编织的陌生化网络中,紧紧抓住它至关重要(“回归敞开山脉中”)。在风靡各地的“都市文艺复兴计划”中,“地方”再次成为吸引力的来源,譬如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伦敦的千禧穹顶、亚特兰大的波特兰中心,以及世界博览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杯,都成为推广地方形象的资源。与此同时,地方的文化遗产也在重新被开掘,城市中心正在经历重新“士绅化”,譬如伦敦考文特花园、圣地亚哥的煤气灯区、波士顿的法尼尔厅地区,以及上海的新天地、武康路等地,这些“旧世界”中的历史标记被重温,人们试图寻找过往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怀念铭刻在地方深处的本真性和根源性。

对另一些人来说,“退回地方”代表一种防御性的做法:拉起吊桥,紧闭城门,以抵御新的侵略(“山脉纳之将门闭”)。按此解释,“地方”是拒绝之所,是尝试性地从进攻/差异中撤离。这是一个政治与文化上保守的安乐窝,一个日趋本质化的(且最终不可行的)做出反应的基地,它没有表明正在运作的真实力量。譬如民族主义和区域性地方观念的复活,其本质特征是鼓吹排他主义,肯定本土的特殊性具有土生土长、根基深厚的本真性。

哈维回到巴尔的摩,以吉尔福德(Guilford)作

为地方研究的起点,原因在于这里正体现了“地方”从敞开到封闭的退化。吉尔福德曾经代表“最佳和最现代的城市规划”,是20世纪初城市郊区化运动的产物,20年代这里已经形成了多种建筑风格混合而成的建筑和街区,开放式的设计没有栅栏和围墙,建筑分布在小公园中间宽大曲折的街道上,俨然新教徒权贵们僻静的世外桃源。不过,随着196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的加剧,隔离墙开始兴建,几起凶杀案的曝光让吉尔福德彻底变成了一个被门禁隔离、警卫森严的社区。当地《太阳报》将它命名为“可防御的空间”。尽管凶杀案最终证明是夫妇家人的自相残杀,但对外来者“不受控制的空间性带菌者”的刻板印象已经成型,空间的边界固化为种族、贫富的界限。吉尔福德最终验证了资本主义地方建构的政治经济学。

“门禁化的地方”并非个案,而是全球化时代一种典型的空间意识形态。在个体层面,不同城市坚守另类生活风格的亚文化群体,利用“地方”来抵抗全球资本主义势力;在民族国家乃至全球化层面,通过“地方”的再神圣化,地方主义信仰正在成为宗教和民族国家强化自我认同的手段。以英国工党政府推动的千禧穹顶为代表,国家热衷于投资纪念性的雄伟建筑,以稳固他们的权力和权威,从集体记忆中唤回荣耀,并将之投诸未来,这往往是资本主义换取救赎希望的唯一美学愿景——奠基于认识地方、根著于地方乃至献身于地方。这一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救赎自身的迫切需要,也导致“逆全球化”正呈现为地方信仰的回潮。

#### 四、全球地方感:超越权力区隔化

如上对于“地方”的祈望和拒斥呈现出对立的美学立场,这通常是因为共享一种根深蒂固的假设:“地方”是封闭的、连贯的、完整的、本真的,像“家”一样,是一个安息之所;“空间”则是多少原本被区域化的,通常总是被分割开来的。马西《保卫空间》指出,“空间”与“地方”构成了一种敌意的立场,一种对于诸如抽象对日常等等二元理论层面的想象——“地方”是有意义的、生命的、日常的(8—10)。

围绕“地方”的阐发既是空间研究的基础,也与日常生活批判紧密勾连,是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思想的重要理论落脚点。问题的关

键还在于,如何抛弃对“地方”偏执的理解并依然保留对特殊性和独特性美学的欣赏,如何以一种更“进步的”方式重新想象地方(或本土性,或地区)?换言之,我们如何可能介入“本土”“地区”,而同时坚持国际主义。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不少空间论者都强调需要重建“全球地方感”——既胸怀天下同时依恋地方的全新的后现代视野。

马西提出“全球地方感”命题,起源于对哈维“时空压缩”理论的批判。在她看来,“时空压缩”的特性描述表达了浓厚的西方和殖民者观点。譬如曾经熟悉的本地小街道,如今布满一连串文化输入品,通常的解释认为时空的压缩与文化的侵入由资本的行动所决定,但事实上,这也与性别、种族和文明优越论有关。通过对哈维和索亚的批判,马西强调“新自由主义新父制”(Neoliberalism Neopatriarchy)不应该被空间研究所忽视。

因此,“全球地方感”需要重建理解空间与地方的“权力几何学”——时空压缩的权力几何学。地方的封闭性和空间的流动性不应该对立起来,人群的复杂移动的过程充满了权力,不仅是资本的议题,也牵涉无所不在的社会关系形式。

不要将“地方”想象成周围有边界的地区,而可以想象成社会关系与理解网络中的连结势态,但是这些关系、经验和理解中,其实有很大的比例,是在一个比我们在那个时刻界定的地方还要大的尺度上建构出来的,不论这个地方是一条街,一个区域,甚至是一个大陆。而这么做,便容许地方感是外向的,觉察到与广大世界的关联,并以积极正面的方式整合了全球和地方。(Massey 315-23)

“地方”不应该被权力区隔化,而应该被观照为一个“社会关系星丛”,一种超越区域的连结势态,它们汇聚在一地“会遇地方”。这将导向一种全球地方感——外向、进步和全球的地方感。其具备的特征包括:一、“地方”绝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过程”;二、“地方”是由外界定义的,不必要封闭地方的分割边界;三、“地方”是多元认同和历史的位置,因此充满内在冲突;四、地方的互动界定了“地方”的独特性,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被不断再生产;五、“地方”是广大社会关系本身,空间

无法脱离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地方的建构亦将立足于社会-空间的再造。总之,“地方”是一种社会关系构造,其社会性与人与人的关系有关,不断处于编码和解码、协商和争议之中,并且具有激进的特质,承认身份和差异政治的重要性。

正是源于“地方”的上述特征,马西定义的“地方”——吉尔本(Kilburun)与哈维定义的“地方”——吉尔福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吉尔本位于伦敦市中心西北,这里张贴着纪念绝食抗议的海报,莫里斯在剧院上演着独角戏、国家俱乐部安排沃尔夫的戏剧、在黑狮子剧院上演《芬尼根的守灵夜》、橱窗展示着印度模特、温布利圆形剧场举办着音乐会……这里有自己的性格,但绝对不是一种没有缝隙、连贯一致的认同和单一的地方感。文化和美学的多元认同造就了此地和其他地方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地方观何以进步?因为享受一种美学化的差异——他们从人群中抽离,以多样性为乐,拥有一种文化资本的获得感,因为有能力欣赏差异而产生了自我价值感。列斐伏尔认为“都市革命”的历史贡献在于,城市创造了一种情境——都市情境。在那里,差异的事物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且并不孤立地存在着,按照它们的差异性而存在。空间是冷漠的,但城市却能把差异统一并连接起来。大都市呈现为一种合理性的谵妄——一种庸常的日常生活、科层体制、权力意志与诗性的瞬间、节庆、灵机、奇迹的结合体。刘怀玉以“诗创实践、瞬间奇遇、欲望造反”总结都市情境美学谵妄与解放相叠合的特征(393)。

譬如蒙特利尔便是列斐伏尔的审美乌托邦,一个被情境化塑造的空间。每个地方变成多功能的、多价的、超功能的,并且伴随着连续不断功能的转换。这是一个大型的展览化的地方,日常性被节庆所吸纳,瞬间性的“刹那美”从变幻的地方中产生,身体、街道、空间向节奏化的诗性体验敞开,都市因其华丽与奇迹而变得晶莹剔透。陆扬指出,“‘奇迹’的要害在于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事件陌生化,从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酝酿日常生活的革命。人必须首先变成‘日常的人’,然后才能变成‘完全的人’”(陆扬 66)。在此意义上,美学精神可望治疗现代理性独断、精神分裂、阶级分化的城市病,而城市的建构应确定并传达着社会关系的本质:源于或导致冲突的互惠性存在与差异的美学。

进而言之,单纯而显著的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进步的地方感,而面向历史的寻根冲动也不必然是反动的。“全球地方感”作为一种都市情境美学,希望超越权力的区隔化,将都市观照为社会关系的星丛并重新结构为一个诗性的整体,这一都市情境美学的生命力在于:在差异性中保持特殊性。

## 五、辩证、开放的时空美学重构

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辩证法强调灵机、奇迹及其代表的开放性,这正是列斐伏尔“三元空间辩证法”、卡斯特尔结构主义城市空间观、哈维“时空(过程)辩证法”和“希望的空间”、索亚“第三空间”的共同理论诉求。其底蕴在于,现代工业城市的象征物将会让位于未决性,这种未决性构成了对城市的不同理解。具体到“空间”与“地方”的辩证思考而言,列斐伏尔、哈维、马西的空间美学“以马克思、柏格森、海德格尔等现当代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为基础”(Arun Saldanha 44),同时他们进一步致力于挑衅并批判海德格尔式的地方浪漫主义诗学,建构马克思主义“更进步的”、开放的地方批判,一种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辩证法。

值得注意的是,马西“全球地方感”的直接灵感来源于约翰·莱希特,和列斐伏尔、情境主义者一样,他们都渴望召唤一种惊奇——“不期而遇之上的不期而遇”——这正是波德莱尔一样的浪荡子所遭遇的那种惊奇。

浪荡子的轨迹不引向任何地方,也不来自任何地方。它是一种没有固定空间坐标的轨迹。简言之,没有任何的参照点以便对浪荡子的未来做出预测。因为浪荡子是一个没有过去或未来、没有同一性的实体:一个偶然性和未决性的实体。(Lechte 102-103)

依据对波德莱尔的重新诠释,列斐伏尔、索亚、哈维、马西引申出“空间灵机观”,通过重申“普遍的形而上的不确定性”,意在对他德格尔的地方诗学展开挑战和纠偏。海德格尔将空间重新构想为“地方”,从原理上为空间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却遇到了真正的难题:海德格尔的地方信仰过于根深蒂固,很少向外部的相互关联的东西

敞开。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者大多具有左派海德格尔主义者特质,他们也认同“都市首要的优先之事乃是让人栖居”(La Revolution urbaine 122),但他们不只坚持诗化、身体化的美学实践和地方性栖居,而强调辩证、开放的社会空间实践。譬如列斐伏尔使用“栖息”(Habitat)而非“居有”(Dwelling),哈维认为海德格尔有机地方观一定会导致民族主义、反移民、反都市化的不良倾向(张一兵 29)。马克思主义空间论者要求立足“都市化—民族国家—全球化”三位一体的整体视野展开社会空间实践。

有关全球化地方的辩证时空构造还得益于巴赫金的启发。“地方”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巴赫金曾经将众生喧哗、复杂多变的时空体赋予小说和语言的分析。巴赫金分析小说之“具体整体”在哈维看来便类似于“地方”,“地方”是“时间和空间指示器”,不仅“时间密集了,丰富了,变得在艺术上可见了”,同时“空间对时间、情节和历史的运动变得敏感,并对其积极回应”,这就是“地方”在人类历史地理学中得以构造的方式。文学想象总是从一个具体的地点出发,从具体到整体、从一隅到世界,“这是人类世界的一隅,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Justice, Nature” 294)。“地方”因此得以超越一个纯粹的、永恒的方位(Position)和地点(Location),而成为被“想象的”时空点,进而是制度化社会关系的构型、物质时间、权力运行以及话语策略,其中隐藏着全球化社会过程的认知地图。哈维总结说:

最终,我把“地方”理解为整个社会生态过程时空动态之中那些相对的“永恒”所具有的内在的、异质的、辩证的和动态的构型。(294)

“地方”的辩证构造正是哈维转向马克思立场的重要标志,标志着空间研究转向“过程”而非“物”的辩证法。借助对《资本论》的深刻领悟,空间研究旨在打破资本主义的物化景观和意识,把开放性、流动性和异质性重新还给空间及其历史,并尝试在社会过程的动态诸关系中探索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一尝试集中体现于哈维“从空间到地方,再回看”之中,意味着从全球尺度落脚于地方再回归空间而复始的现象学循环,这一意向性



体验过程不再单纯赋予特殊地方以寻根式的怀旧,而是从根源处追溯连接不同地方的社会关系,进而探寻“地方”如何被建构和体验为物质的、生态的人造物,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地方”作为“过程辩证法”的凝聚物,呈现为部分与整体、历史与未来、生成与永恒的相互构造,“可能的世界”也是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过程”最终决定了空间形式。

以“地方”及其社会过程时空动态的辩证思考为轴心,列斐伏尔、哈维等人作为“都市社会”的审美乌托邦,转向以“地方(场所)精神”和空间正义为核心的差异地理学和生态批评,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文化理论开拓了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对当下各种形式的“审美主义”倾向有纠偏作用。(阎嘉)这一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野下的都市美学实践也塑造了“空间转向”的基本旨趣,譬如让·鲍德里亚以符号学解码的方法阐释超空间、类象与仿真之间的关系,居伊·德波围绕巴黎经验建构出心理地理学和情境主义美学,展现出地方性、切身性经验对全球化抽象空间批判力量。卡斯特以结构主义立场重新阐述了地方与媒介文化、亚文化、城市草根社会运动的关系,与哈维一样,“时空压缩”时代“流动性地方”的畸变与重塑是其关注重点。另外,索亚、马西、迪尔等借助对“第三空间”和后现代地理学的深入描绘,强调开放、辩证姿态对待正义、自然、地方和传统,一种文化和美学视野下的“全球地方感”具有强烈的当下指向。

## 结 语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空间理论,主张“空间—地方”视野下辩证、开放的时空美学重构,推进了全球化时代社会空间的批判与实践,因其对后现代都市状况的针对性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其一,对于“地方终结”的探讨唤醒了对于城市本土性与原真性美学的思考。“地方”既是具体的居住地和家乡,更是抽象的、先验的、超越的存在真理之场所。海德格尔的“作为存在场所的地方”理论是空间研究的重要根基,但是海德格尔式的“地方信仰”以及空间拜物教却是需要警惕的对象;

其二,面对后现代都市地方性的消逝,强调在“都市化—民族国家—全球化”的维度上重新思考“地方”。其核心的路径在于追溯连接不同地

方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单纯赋予特殊地方以寻根式的怀旧。空间的生产是最具包容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将身份认知置于为斗争、自由与解放而选择的时空之中,开启了全球化时代差异化兼具特殊性的都市美学实践;

其三,受益于波德莱尔瞬间性诗学和巴赫金时空体理论,宣扬“地方”充满机遇并具有未决性。面对工人被豪斯曼式建筑排挤到城市边缘的现实,空间的情境主义强调节日的瞬间革命性质,“节日”创造的“生活方式”颠覆了对传统空间的习惯性使用方式。节庆、狂欢、革命是“理想”的变式,波德莱尔审美现代性的二元“忧郁与理想”演进为“节庆与革命”,城市诗学导向城市革命,日常生活批判也最终转向了空间的生产;

最后,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高度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想象的”空间美学。从列斐伏尔的诗性乌托邦创想到哈维作为时空乌托邦的“希望的空间”、苏贾的“第三空间”、马西的“全球地方感”等,都旨在重构一个未来的、世界性的、平等化的空间。理想城市是超越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未来存在,而回溯城市发展史,“城市”这个形式本身一直是流动和暂时的,惟有它的艺术形式是永恒的,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作为艺术作品而存在(*Writings on Cities* 173)。在此,空间研究及其“过程辩证法”似乎呼应了马克思“反城市”的立场,唯有城市消融于艺术形式之中,文明最终才能取代野蛮(譬如城乡二元对立),形成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 Augé, Marc.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9.
- Castells, Manuel.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Couldry, Nick, and Anna McCarthy. “Introduction. Orientations: mapping MediaSpace.” *MediaS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2004. 9.
- Debord, Guy.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Ken Knabb. Canberra: Hobgoblin Press, 2002.
- Harvey, David.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80.3(1990): 418-34.
- .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 Oxford: Blackwell, 1996.
- .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 Heidegger, Martin. *Off the Beaten Track*. Trans. Sun Zhouxi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 艾伦·莱瑟姆等:《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邵文实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
- [Latham, Alan, et al. *Key Concepts in Urban Geography*. Trans. Shao Wenshi.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 Lechte, John. “(Not) Belonging in Postmodern Space.” Eds. Sophie Watson and Katherine Gibson. *Postmodern Cities and Spaces*. Oxford: Blackwell, 1995. 102 - 103.
- Lefebvre, Henri. *La Revolution Urbaine*, Paris: Gallimard, 1970.
- . *Writings on Cities*. Trans. Elizabeth Lebas and Eleonore Kofman. Oxford: Blackwell, 1996.
- Lippard, Lucy. *The Lure of the Local: Sense of Place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77.
-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 [Liu, Huaiyu. *Mediocrity and Miraculousness in Modernity: A Tex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enri Lefebvre's Critical Philosophy of Everyday Lif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6.]
- 陆扬:“列斐伏尔:文学与现代性视域中的日常生活批判”,《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5(2009): 66—74,159。
- [Lu, Yang.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View of Literature and Modernity.”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5(2009): 66 - 74,159.]
- Massey, Doreen.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Barnes, Trevor. and Derek Gregory. eds. *Reading Human Geography*. London: Arnold, 1997. 236 - 323
- 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
- . *For Space*. Trans. Wang Aisong.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 Meyrowitz, Joshua.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ness*. London: Pion Limited, 1976.
- Saldanha, Arun. “Power-Geometry as Philosophy of Space.” Eds. David Featherstone and Joe Painter. *Spatial Politics: Essays for Doreen Masse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3. 44.
- Shields, Rob.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Sorkin, Michael. “Introduction: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xiv.
- . “See you in Disneyland.”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205 - 233.
- Thrift, Nigel. “Inhuman Geographies: Landscapes of Speed, Light and Power.” Ed. Paul Cloke. *Writing the rural: Five Cultural Geographers*. London: Paul Chapman, 1994. 212 - 213.
- 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与地方》,潘桂成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年。
-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Trans. Pan Guicheng.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98.]
- 阎嘉:“不同时空框架与审美体验:以戴维·哈维的理论为例”,《文艺理论研究》6(2011): 36—41。
- [Yan, Jia. “Different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Harvey as an Exampl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6(2011): 36 - 41.]
- 张也:“空间、性别和正义:对话多琳·马西”,《国外理论动态》3(2015): 2—8。
- [Zhang, Ye. “Space, Gender and Justice: A Conversation with Doreen Massey.”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3(2015): 2 - 8.]
- 张一兵:《照亮世界的马克思:张一兵与齐泽克、哈维、奈格里等学者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 [Zhang, Yibing. *Marx Who Illuminated the World: Zhang Yibin's Interview with Zizek, Harvey, Negri and Other Scholar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责任编辑:王嘉军)